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March 2003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大 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9
人权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年

2003 年 3 月 5 日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科特迪瓦政府对联合国紧急人权特派团报告的评论意见（见附件）。该报告于 2003 年 1 月 24 日印发，编号为 S/2003/90。

请将本评论意见全文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9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荷。

临时代办

诺埃尔-埃马纽埃尔·阿伊波·盖博（[签名](#)）

2003 年 3 月 5 日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科特迪瓦政府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实况调查团关于 科特迪瓦人权情况的报告的评论意见

导言

2002 年 9 月 18 日至 19 日夜,经历了两年动荡岁月的科特迪瓦重归安宁与幸福的梦想,瞬息之间变成了梦魇。一场闻所未闻的空前暴力闯进了历史。由于这场暴力发生在科特迪瓦曾经拥有的最和解的一届政府刚刚成立不久,没有任何预兆,所以更加令人伤痛。

从那一日起,不幸伴随着战争降临。由于人类常常迷恋于滥用权力和武力,和平年代尚要对人权时刻保持警惕。到了战争之时,即便是最有德行之人,在生存本能、各式各样的怂恿和骚扰、特别是偏激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也会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暴力倾向。

所以,危机年代也是自我超越的年代,是鼓起勇气抓住一切机会摆脱危机的年代。科特迪瓦人民和科特迪瓦政府正是从战争一开始,就以尊重人权为基石,致力于这种自我超越。

科特迪瓦很早就采取了许多措施,并已将措施的详情通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科特迪瓦向所有希望调查人权状况的国家和国际人权捍卫组织敞开了大门。

为使局势更加明朗,科特迪瓦政府于 2002 年 11 月 5 日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派遣调查委员会。

这一请求在充满敌意的国际舆论环境(许多觉醒的科特迪瓦人甚至说到具有多种形式的国际反科阴谋)中提出,至今没有任何下文。这种态度与联合国对除科特迪瓦外的其他国家政府请求派遣特派团所作回复之迅速形成鲜明对比。回复科特迪瓦的请求原本可以避免连特派团自己也承认的仓促(见报告第 1、2、3 和 5 段)。尽管如此,科特迪瓦人民仍对特派团抱有很大的期望。

不幸的是,这一新选择所带来的希望已告落空。

战争本身就构成对人权的侵犯,因此不是行使人权的理想环境。但是,政府不会包庇在其控制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政府决定,即使付出代价,也要走真相之路。然而,它伤心地发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实况调查团并没有走上这条真相之路。

报告显示，特派团性质模糊不清(一)。报告还不够严谨(二)，撰写者也有失公正(三)。

一. 特派团性质模糊不清

2002 年 11 月 5 日，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通过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请求派遣科特迪瓦侵犯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

2002 年 12 月 20 日，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在地会晤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时重申了这一请求。秘书长也尽职地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派遣特派团，以收集科特迪瓦境内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确资料。特派团于 2002 年 12 月 23 日至 29 日在科特迪瓦停留，名为实况调查团。

调查实情，意味着他们要诚实；这么做，则暗示着要揭示某些责任。报告第 7 段写道，特派团的目的“不是为了指责任何一个人”，而是“收集能够帮助安全理事会了解现场情况并寻找和平之路的资料。”好啊！但说实话，我们能够查明实情而不指责任何人吗？我们能够查明实情而不分清责任吗？正是实况调查团这种概念上的模糊不清，说明了报告所阐述的工作方法，其实是方法论的要素。还是这种模糊不清，让人最终明白特派团终于避开了它想要避开的东西。例如：

- 第 13 段：特派团在引述科特迪瓦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之后下结论说，这项决定会造成大部分科特迪瓦人被排斥。这显然是一种价值判断，而特派团只应当陈述事实。总之，法院规定共和国总统候选资格的一项决定如何会排斥一部分人，请特派团给予解释。
- 第 12 段：“公民身份、国籍和候选高级职位的资格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特派团如何会得出这一结论？这种判断也是它的目标之一吗？
- 特派团收集了许多证据。

但它显然忽视了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在阿比让和日内瓦交给它的数百份证据。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喜欢强调自己不是调查委员会的特派团不收集证据；但如果它收集证据，那么最起码的公道也要求它必须考虑所有已收集到的证据。

- 第 57 段：特派团说，已“收集到资料，说明行刑队可能是由政府亲信、总统卫队和总统所属族裔的部落民兵组成。”还声明已“获悉了一些姓名”。

二. 不够严谨

不够严谨表现为不明确、对事件分析的轻率和不准确。

A. 不明确

不明确之处很多，而且损害了特派团的可信度。既涉及消息来源，也涉及发生的事件。

1. 涉及消息来源

特派团多次提到“一些人权组织”提供资料而不说出这些组织的名称（第 84、89 和 153 段），但它又大量提及大赦国际。

这种做法让人禁不住要问：

- 特派团是不是对这些组织所报告的重大事件有所怀疑？
- 特派团是不是暗示这些组织不大可信，因为它们确实听命于某些政党？
- 还有，这些组织真的存在吗？

由于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清点 30 多家与其有坦诚合作的人权捍卫协会，提出这些问题就更理所当然了。

2. 涉及提出的事件

例如第 51 段提到，有三名原籍布基纳法索的移民（Yabré Sebré、Masse Haïdou 和 Masse Ali）被处决，但没有说明他们在什么情况下被杀。与科特迪瓦爱国运动（科爱运）的战斗人员有关吗？为什么恰好是他们被杀死？布基纳法索人在科特迪瓦是不是成批地被处决？布基纳法索政府在外交界大量散发备忘录，* 捏造科特迪瓦人的反布情绪，特派团有没有受到影响？

B. 对事件的分析轻率

特派团对所收到的资料妄加分析，满足于作一些无根据的断言和仓促的结论。

1. 大量无根据的断言

特派团在未拿出丝毫证据或刚刚有一点最起码的证据时就下断言。

例如：

- 第 98 和 99 段：特派团提到仇恨和仇外行为的表现、“某些科特迪瓦人”反对北方人的行动、以及国家广播和电视散布煽动族裔仇恨的信息。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举出任何例证或消息来源。
- 第 94 段：特派团武断地说，在政府控制区设有拘留和酷刑中心，并说

* 科特迪瓦政府已对此备忘录作出答复；人权事务部长和科特迪瓦驻外各外交使团备有答复的副本，可供查阅。

军营、宪兵和警察学校都是可能之所在。特派团如何得出这些地点可能是拘留和酷刑地？特派团未去现场核实这些事件，没有尽到调查的责任。

- 第 111 段：特派团说，共和人士联盟（共和联盟）与科特迪瓦民主和人民联盟（原文如此）* 在行使言论自由时受到威胁，其中一些成员还被劫持和处决。这些断言没有任何证据。
- 第 118 段：特派团说，一些人权捍卫者掌握有保安部队对柔弱街民的抢劫、行凶和掠夺事件的资料，却未指出人权捍卫者的名字。尽管特派团也如它所主张的那样去了现场，却根本没有想着为了证实上述事件而向居民收集资料，但它竟然声称曾于 2002 年 12 月在自 2002 年 9 月 20 日以来被摧毁的多个地点会见了一些居民。

列举的所有事件原应与政府当局进行核实。不核实的话，特派团就没有尽到分析事件的责任，因此也就不能严谨地评价所收到的资料。

2. 对所收资料妄加评价

特派团在评价所收到的资料时，不知道凡是调查者都应该遵守的规则。尽管特派团声称自己不是调查团，但它的举动却象是要听取所有知情人的陈述并考虑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以期提出必要的相反意见来核实这些事件是否准确。

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 第 84 段：特派团转述某一人权组织的声明说，该组织估计有 150 人被政府军拘押。特派团在公布这一消息前未与政府当局核实。此外，关于被叛军关押的人数，特派团说：“不过据信叛军拘押了 11 名宪兵。”从这里所用的动词“据信”可以断定未作任何核实，特派团对自己提出的资料也不敢确信。而据我们所知，叛军在占领布瓦凯等城市之后，关押了数十名宪兵和保安部队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当时这些人并未处于交战状态。
- 第 85 段：特派团能够核实 Alain GUEI 中士的关押情况，却不能核实据它说被关在国土警戒局的五人。然而，这一警察机构就设在特派团下榻的阿比让。特派团也没说有关这些被关押者的资料来自何处。
- 第 87 段：特派团说，“法国军队到来后，布瓦凯应没有即决处决宪兵的事件发生。”这一消息令人困惑，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士兵驻扎在各战斗前线 and 布瓦凯市通往东部走廊的出口处、在布瓦凯至姆巴亚克罗一线、在浸信会学校，并未驻扎在布瓦凯市内，更没有驻扎在叛军的各个

* 见下文评论意见。

根据地，他们如何能够进行控制？

此外，报告说科特迪瓦爱国运动（科爱运）拘押了一些人但未说明人数。而特派团原本应当坚决向叛军要求看望这些被拘押者，并评述拘押的情况。

- 第 114 段：特派团说，一些政党代表坚持强调“有人因公开批评政府而被杀害。”这是最能说明特派团对所收资料妄加评价的例子。因为报告中所使用的“有人”一词，明显是指科特迪瓦已不存在反对派。

而实际上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言论和思想的例子很多，比如一些日报社论有时大唱反调；言论自由竟然导致政府部长辞职，却没有因此被杀害。特派团再一次没有彻底调查。

- 第 122 段：特派团所用的条件式句型让人怀疑西部两支反叛运动（科特迪瓦大西部人民运动和正义与和平运动）所犯事件是否属实，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两支运动的战斗人员大肆劫掠、摧毁住宅和屠杀平民。来自该地区的流离失所者和本国、甚至国外的广电频道其实早已证实了这些事件。
- 第 124 段：特派团说，有消息称国家武装部队已从布洛莱金市众议员那里获知该地区的劫掠和亵渎墓地事件。虽然布洛莱金市众议员已被科特迪瓦国家武装部队引述为消息的来源，但特派团仍认为没有必要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而与其联系。
- 第 134 段：特派团说，“没有任何关于有人被指控或被绳之以法的具体资料，不过最高级政府官员已向特派团保证正在提起诉讼。”这再次证明未经任何调查就确定了事实。

事实上，特派团原本应当象在达洛亚那样，到位于阿比让的军事法庭预审室或第一审法庭核实一下是否有这些诉讼，以及进展情况如何。此外，特派团还应当前往各拘留所和教养所，核实一下这些人是否确实被关押在那里。

C. 不准确

总体上看，报告陈述了许多不准确的事件和资料。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下是几个让人怀疑特派团工作严肃性的例子。

举例如下：

- 第 4 段：特派团说会见了许多政府成员，包括代表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的贸易部长。除“会见”一词含糊不清，未明确是工作会议之外，政府必须说明的是，联合国特派团经过阿比让时，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一职

由政府发言人、经济基础设施部长 Acht Patrick 先生代理。此外，科特迪瓦政府设有两个贸易部：

- 一个是国内贸易部，部长为杰戈内夫拉市众议员、科特迪瓦人民阵线（科人阵）成员 Odette Sauyet Likikouet 女士。
- 另一个是对外贸易部，部长为塞盖拉市市长、共和人士联盟（共和联盟）成员 Amadou Soumahoro 先生。

还有，政府强调，在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不在期间，其办公室主任曾打算与联合国“实况调查团”举行工作会议，但没有成功。

- 第 55 段：特派团说，Dacoury Tabley 博士被杀害之前，曾被科特迪瓦保安部队以调查为由拘押两天。特派团从何处获得这条错误消息？如果它花点时间去读一下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交给它的案卷附件，它就该知道其实无法确定 Dacoury Tabley 博士是被保安部队拘押。单凭阿比让宪兵队搜查组 2002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942 号笔录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 第 27 段：报告说，科特迪瓦北部靠近利比里亚边境的接待区有 6 万难民。不知道说的是北部哪个地区？这一说法明显不准确，因为利比里亚边境不在科特迪瓦北部，而在西南部。

此外，报告让人以为，作为该国北部最大城市的科霍戈不在科特迪瓦北方地区，因为它说科特迪瓦清查出的难民总数为 7.2 万，其中 6 万在北部，1.2 万在阿比让、马恩、布瓦凯和科霍戈。还有，该国清查出的难民总数为 7.2 万，在 3.2 万利比里亚难民离开之后，怎么还会得出结论说，难民专员办事处希望将该国仍有的 6 万难民转移到南部？

- 第 111 段：特派团说会见了“科特迪瓦政治团体的代表，包括（……）科特迪瓦民主和人民联盟。”必须指出的是，已故 Robert Guei 将军（报告暗指的无疑是他）的政党确切名称是争取科特迪瓦民主与和平联盟。这一错误让人有理由怀疑特派团是不是真的会见了该党成员，尤其这一错误还在报告中多次出现（第 111 段 2 次，第 112 段 2 次）。
- 第 133 段：报告似乎说是说人权事务部长级办公室是在冲突爆发之后成立。实际上，该机构是 2002 年 8 月 5 日政府部门改组后成立的。而且，尊重人权始终是政府的一项关切，政府在 2002 年 8 月 5 日之前就已在司法、公共自由和人权部内成立了人权司。
- 第 137 段：报告说，被称为 2000 年 10 月“约普贡乱葬坑”的案件没有下文。这一说法是不准确和完全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在联合国报告指明宪兵是这些行为的涉嫌元凶后，对上述宪兵的司法诉讼程序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在持续，但结案时，因为不能确定他们有罪而宣告他们无罪。必须强调的是，原本可以帮助法院找到罪证的本案传讯证人拒不到庭，所以不能说本案是有罪不罚。而且，国家元首已要求重新审理此案。阿比让第一审法庭还为此成立了三个预审室（第 8、9 和 10 预审室），以重新开始诉讼程序。

- 第 145 段：报告说，一部分科特迪瓦人得不到保护，而且存在一种基于原国籍的歧视。这一说法根本没有反映实情，而且显得对“科特迪瓦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偏见。其实《宪法》第二条“人，生皆自由，法前皆平等，”已确认该原则。

所有这些不准确之处都显示了这份报告的不公正。

三. 特派团的不公正性

12 月 19 日和 20 日，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在访问日内瓦时得到承诺：联合国将根据有关规则派遣一个公正的特派团。而实际上我们看到，承诺并未得到兑现。报告中多处显示出特派团有失公正。

A. 让人引起联想的一些表达方式和用语

- 第 8 段中提及“政府及其支持者”似应是与科爱运相对而言。这里的意思难道是说：冲突只是关系到政府及其支持者，而不是这个国家受到攻击、冲突应当关系到全体科特迪瓦人？

其实是科特迪瓦受到了侵犯。

政府及其支持者的说法使人相信这样一个论点，即：不合法政府及其死硬的支持者在顽抗科特迪瓦的解放者。是否需要提醒特派团，科特迪瓦所有政党都谴责了侵犯者，难道他们是当前执政政权的支持者吗？

- 第 48 段中将叛乱 (rebellion) 称为“反叛” (mutinerie)。认真想一想，2002 年 9 月 19 日爆发的是反叛吗？

“反叛”是“造反”的行为。“反叛”的意思是集体公开拒绝服从管辖当局的命令。

有计划地进行暗杀以及冷酷杀害一名共和国部长及一些文职和军职高级当局人士算是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吗？

强奸妇女与军纪有什么联系吗？

指挥叛乱的背叛者算是科特迪瓦合法部队的成员吗？

布瓦凯和国家西部的科爱运——科特迪瓦大西部人民运动——正义与和平运动的雇佣军也算科特迪瓦军队的一部分吗？

在这里讲反叛，其实是对引发冲突的事实进行表态，从而使得科特迪瓦人遭受的侵犯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当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明确系科爱运及其分支（科特迪瓦大西部人民运动和正义与和平运动）所为时，特派团的叙述则是轻描淡写，所用的标题无关痛痒。在一个快节奏的网络社会，读者常常没有时间推敲语句，有时甚至只注意段落标题，因此这种写作方法轻易就达到了其目标。

就是这样，特派团在认为是政府方面所为时选用了“行刑队”一词（对读者造成强烈的第一印象），而对叛乱分子雇佣儿童兵却采用了“儿童待遇”的说法。

我们认为，如用“儿童兵”作标题则要生动得多。

B. 关于冲突的起因

关于特派团认定的冲突起因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派团的报告对科特迪瓦目前经历的危机确定了四项起因。

特派团先后列举了如下问题：

- 国民意识；
- 科特迪瓦民族性这个概念；
- 农村土地；
- 宪法。

对这些原因经过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原则上这些并不能作为解释危机的原因；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这些原因缺乏依据。

对于前三项原因提出的不满涉及：非本国国民获得科特迪瓦国籍的条件苛刻以及拒绝外国人充分享有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出于危机纯粹是科特迪瓦内部问题的假定，把外国人问题作为导致危机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

《宪法》、特别是第 35 条被认为是排斥性的，但是宪法是在所有各政党的号召下经过全民投票通过的。

因此，认为由科特迪瓦人民产生的《宪法》不是来自科特迪瓦人民，这种说法不合乎情理。

说这项《宪法》有问题纯粹是政治炒做，不可作为造成科特迪瓦当前危机的缘由之一。

报告中的各项起因都不成立，除非认可冲突实际上是国外根源引起的。

可惜特派团没有探究这一途径，而考虑到叛乱分子所用的手段和得到的补给，危机还包括而且特别是有国外根源，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根据国际文书，对此应当予以谴责。

鉴于前面所作评论，我们应当对这些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可以发现：把这些作为当前冲突的重要起因是不成立的。

(a) 国籍问题

国籍的定义是“属于一个国家的组成人口”，1972 年经过修订的 1961 年 12 月 14 日第 61-415 号法律对科特迪瓦国籍作出了规定。

对《国籍法》的不满在于，1972 年以后取得国籍的条件过于苛刻。因为以前可以根据《国籍法》第 17 至 23 条的规定通过申报取得科特迪瓦国籍，而这种可能从 1972 年起取消了。

即使是根据这项法律，当非本国国民进行申报时，科特迪瓦根据上述第 23 条可以接受或者拒绝这一申报。

这是国家可以对希望取得科特迪瓦国籍的非本国国民进行取舍的主权的表现。

实际上，“根据目前的国际法，国籍的问题原则上被认为属于各国的管辖范围。每个国家自由决定给予国籍需要什么条件，任何其他国家不可越俎代庖”。¹

国家制定其国籍规则的专属权力和绝对自由已经得到国际判例、尤其是 1923 年 2 月 7 日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b 系列，4）的认可，并于 1955 年 4 月 6 日在诺特博姆一案中得到国际法院的认可。

经过 1972 年的改革，科特迪瓦自由地确定了为取得科特迪瓦国籍所需的统一和平等的条件。这些条件从未引起侨居科特迪瓦的非本国国民的不满或争议。

这里其实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国籍问题，把国籍问题作为当前危机的起因是不成立的。

第 11 段没有对那些概念进行任何整理，缺乏条理，其中有些拼凑是有害的。特派团采用了叛乱者为其所作所为找根据而编造的论点。

¹ Bernard Audit, 《国际私法》, Economica 1991, 第 726 页。

文件试图说明国民意识是科特迪瓦当前经受的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报告起草者谴责 1972 年的国籍法是引起移民家庭真正遭受失望挫折的原因。

这里，我们不禁疑问：为什么 1972 年法律在十几年之后才产生效应？人们可否推定另一种论点，即某些政治人士巧妙地利用历史情况、在政治方面上推出移民问题（而其实移民们本来从未考虑过在科特迪瓦行使什么公民身份权²）以便在政治上引起更多公众的兴趣。

(b) 科特迪瓦民族性这个概念

特派团宣称这是科特迪瓦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报告中并未说出据称受到争议的这一概念的定义。

科特迪瓦法律和当前政府的纲领中都不存有“科特迪瓦民族性”这一概念。

按照其构想者亨利·科南·贝迪埃总统所作的定义，“无论属于什么民族、宗教、区域和种族，人人、甚至外国人都可以有科特迪瓦民族性”。

“科特迪瓦民族性是科特迪瓦人、不含任何排斥的全体科特迪瓦人的独特文化，与部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截然相反的”。³

且不说我们赞同这些言论，从其构想者所作的声明中尤其可以看出，这决不是一种排斥手段，不可能成为危机的理由。

另外，2003 年 1 月 24 日的利纳——《马库锡协定》中并未将这一概念作为冲突的起因。

(c) 农村土地方面

有一种成见认为，科特迪瓦土地改革损害了外侨的利益。为对这一指控进行准确评价，应当列出土地改革之前的法律，以确定前后的演变情况。

(1) 改革前的成文法

改革前的土地制度的渊源主要由下列文件构成：

- 1932 年 7 月 26 日改革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令；
- 1964 年 4 月 16 日禁止不动产私署证书的的法令；
- 1970 年 3 月 20 日制订《1970 年管理财政法规》的第 70-209 号法；

² 在此方面，对加纳的布基纳法索族群所作的调查显示出他们与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的态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³ 《Racines-Revue Culturelle Africaine》第 3 期，1998 年 6 月，第 87 页。

- 1971 年 2 月 16 日关于地产和土地程序的第 71-74 号法令。

1971 年 2 月 16 日第 71-74 号法令第 2 条说明了该项有关农村土地的成文法的内容的特点，其规定为：“土地使用权为习俗权利，属于行使这项权利者个人，而不能以任何名义转让。在共和国全国境内，任何人不能作为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该法令第 1 条规定，必须持有农业部颁发的或者依据临时或可撤销的占用许可颁发的临时或彻底转让证书，才可合法占用农村土地。

这项条款产生如下两个结果：

- 只有行政当局有权颁发占用证书。需先获授予彻底转让证书，才可取得土地所有权证。上述法令第 3 条规定了完成这一事项所需的程序，包括：申请、行政调查、授予占用许可证及临时转让证书、以国家名义进行注册和开发利用证明。

按照有关规定，任何习俗权威或任何乡村头领均不可将一块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授予另外一名个人，无论此人是否是科特迪瓦人。

所有权转让和有关物权的主要交易必须以公证证书进行。1971 年 2 月 16 日法令第 5 条和 1970 年 3 月 20 日财政法规定，必须满足这一要求方可生效。

有人能够提出有名有姓的证据，指出哪一名依据合法程序持有土地证书或是产权受让人的外国人被剥夺了权利吗？

- 习俗惯有土地上因为包括请求收回所有权的种植园，所以没有进行注册；这些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乡村集体只有使用权。1971 年 2 月 16 日法令第 2 条明确指出，在共和国全国境内，任何人不能作为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由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这些土地进行任何买卖均构成“卖方非财产所有人”的买卖。

科特迪瓦各法院就此问题作出一贯的判例。阿比让上诉法院 1976 年 11 月 5 日的判决（《科特迪瓦法律期刊》第 1 期、第 2 期第 50 页和第 4 期）判定：关于种植园的协议应当作废，无论种植园是被出售或质押，都应命令归还种植园，并退还支付的款项。

阿比让上诉法院 1978 年 2 月 24 日的裁决（1982 年《科特迪瓦法律期刊》第 1-2 期第 51 页和第 91 期）认为：地方集体头领对土地享有收益权，只有得到地产行政命令的批准才可转让或出租；未经此类批准，各方之间的租约没有任何效力。

Adzopé分庭 1986 年 5 月 16 日第 74/86 号判决书中判定：“没有注册的农村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没有正式注册手续的情况下，有关土地占用者只对土地享有单纯临时使用权，可以通过其劳动得到收获和收益”。

因此，改革之前的法律既不允许科特迪瓦人也不允许外国人获得习俗惯有土地。因此可以说，即使在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任职期间，“土地归属其开发者所有”的原则从未作为科特迪瓦成文法的一部分。

(2) 改革后的情况

政变发生之前，经过全体众议员一致投票通过的 1998 年 12 月 23 日第 98-750 号法推行的改革目的是，将条文散乱、造成复杂问题的一套系统整理得更加协调一致。

该项法律对农村土地进行了定义，并确定了其组成成分，包括：国有土地、公共集体所有土地及个人所有土地、无主土地及过渡性土地、习俗惯有土地及国家让与公共集体和个人的土地。

改革没有取消先行注册才能获得所有权的要求，革新之处在于引入了习俗权利的证明程序。这个问题曾在属于相同习俗的科特迪瓦人之间引起争论。

各法庭在判决习俗所有权问题方面过去经常碰到非常棘手的困难。

此外，1998 年 12 月 23 日第 98-750 号法对农村土地的让与和转移制订了规范。

和以前的情况一样，行政当局处于交易的中心位置。第 15 条规定，任何给予一块以国家名义注册的土地的合同均需由让与人提出明文申请通过行政当局进行转让，同时转让不得侵害第三者的权利。另外还明确指出，临时租让不得转让，而且禁止承租人直接转让合同和进行转租。

除此之外，农村土地所有人可以自行支配其土地。因此，农村土地所有人可以与外国人或科特迪瓦人签订合同，但须遵守第 1 条的规定，即在这种情况下虚有权只能保留给科特迪瓦人（无论其原籍就是科特迪瓦人还是归化的科特迪瓦人）。

实际上，新的科特迪瓦土地制度对外籍善良占有人起到保护作用，防止不诚实的当地人将不属自己所有的土地以非法程序出售或出租给外籍善良占有人。

另外，通过对西非经共体各国、特别是布基那法索通过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就农村甚至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只保留给本国国民这一条款来说，各国法律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科特迪瓦土地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符合科特迪瓦人的精神，而且符合非洲人的精神，即土地是不得转让的，这是因为“土地不

仅属于当代人，而且甚至更是属于祖先和子孙后代” (1)。因此，西方和非洲的伟大法学家们认为，个人可以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概念与非洲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是相违背的(2)。⁴

这就是科特迪瓦人之间产生土地问题的原因，例如 Abouré人和 M' Batto 人之间的土地问题，这两个族裔多年以来存在冲突。

(d) 宪法

《科特迪瓦宪法》、特别是第 35 条被批评具有排斥性。

例如，特派团提及最高法院宪政分庭拒绝了 14 个人的总统候选提名。

对这一判决的解读似乎不是特派团作出的，第 35 条显然不是拒绝上述候选人提名的唯一原因。不符合参选资格所需手续是否决了这些候选提名的主要依据。

实际上，在 19 项候选提名声明中，有 12 项遭否决，两项放弃。

遭否决的有：

阿拉萨尼·乌亚塔拉被除名的原因是：

- 母亲的姓名与出生证明书上不一致；
- 可疑的国籍证明书；
- 品德不可靠；
- 曾用过另外一国国籍。

亨利·科南·贝迪埃被除名的原因是：

- 未进行体检。

Boa Amoikon Tiemele Edjampan 被除名的原因是：

- 迟交保证金。

Emile Constant Bombet 被除名的原因是：

- 品德不可靠。

Faustin Leka 被除名的原因是：

⁴ 《Les grands systèmes de Droits Contemporains》，René David and Camille Jauffret-Spinozi, Dalloz 1992, 第 449 页, David and Jauffret-Spinozi Op. Cit. 第 451 页, M' Baye 《Droit et Développement en Afrique Francophone de l' Ouest》Volume (A) 《les aspects juridiques du développement de l' Economie》1966 第 212-165 页。

- 未付保证金。

Gaston Ouassenan Kone 被除名的原因是：

- 迟交保证金。

Lanzeni Coulibaly 被除名的原因是：

- 材料不齐。

Coulibaly Climanlo 被除名的原因是：

- 未辞去公职。

Lamine Fadiga 被除名的原因是：

- 品德问题。

Dramane Toure 被除名的原因是：

- 材料不齐。

Paul Pepe 被除名的原因是：

- 材料不齐。

Bamba Morifere 被除名的原因是：

- 未辞去公职。

另外，第 154 段的第 8 条建议指出“应尽一切努力在考虑到国际人权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对国家宪法达成全国共识”。科特迪瓦宪法已经以 86% 的绝大多数获得投票通过，这里的共识是指什么？所有政党、包括对之提出异议的共和人士联盟都呼吁投赞成票。该协商的透明度从未受到怀疑。

此外，科特迪瓦宪法应当考虑到的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是指哪些？

特派团对此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据我们所知，世界上不存在宪法范本。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宪法。

实际上，我们从字里行间领会到了叛乱分子和特派团对共和国总统选举资格的关切。在这方面，各国都订有自己的标准，根据其自身情况编订本国宪法。例如：

阿尔及利亚

第 73 条

参加共和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必须：

- 只有阿尔及利亚国籍且为其原有国籍；
- 具有穆斯林信仰；
- 选举之日年满 40 周岁；
- 享有全部公民及政治权利；
- 证明配偶是阿尔及利亚国籍；
- 1942 年 7 月之前出生的候选人须证明参加了 1954 年 11 月 1 日革命；
- 1942 年 7 月之后出生的候选人须证明其父母未参与敌对 1954 年 11 月 1 日革命的行动。

贝宁

第 44 条

有以下情况者不得作为共和国总统职务候选人：

- 出生国籍不是贝宁人而取得贝宁国籍不足十年；
- 品德不良或不是十分正直；
- 不享有全部公民及政治权利；
- 提出候选提名之日不满 40 岁或超过 70 岁；
- 进行选举时不在贝宁共和国境内常住；
- 不具备向宪政法院宣过誓的三名医生形成的医审团按照规定出具的完整的身心健全证明。

布基那法索

第 38 条

布基那法索总统职务候选人必须：

- 出生国籍为布基那法索且父母也是布基那法索人；
- 提出候选提名之日年满 35 周岁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加蓬

• 第 10 条

……所有享有公民及政治权利的男性和女性加蓬人，如满足下列条件，可参选共和国总统：

- 年满 40 岁且不超过 70 岁；
- 任何取得加蓬国籍者不可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在其后代连续在加蓬居住的情况下，只有从第四代起才可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马达加斯加

- 第 46 条

任何共和国总统职位候选人必须：

- 原有国籍是马达加斯加；
- 享有公民及政治权利；
- 提出候选提名之日年满 40 周岁。

现任共和国总统如希望作为候选人，必须在竞选运动开始前一天辞职。

马里

- 第 31 条

共和国总统职位任何候选人均须：

- 原有国籍是马里；
- 享有全部公民及政治权利。

尼日尔

- 第 37 条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参选共和国总统：

- 任何原有国籍是尼日尔的尼日尔人；
- 年满 40 岁且享有公民及政治权利。

该法规定了参选资格和提出候选提名的条件……

塞内加尔

- 第 23 条

共和国总统职位任何候选人均须：

- 只具有塞内加尔国籍；
- 享有公民及政治权利；
- 年满 35 岁。

乍得

- 第 62 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男性和女性乍得人可提出共和国总统职务候选提名：

- 出生国籍为乍得；
- 生身父母原有国籍也为乍得且没有乍得以外的其他国籍。

突尼斯

- 第 40 条

任何符合下列条件的突尼斯人可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 不具有另一国籍；
- 信仰穆斯林宗教；
- 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保持突尼斯国籍而无间断；
- 年满 40 岁且不超过 70 岁，并享有全部公民及政治权利。

列举了这些宪法的内容，可以得出几条意见。

国际人权法的原则规定，区别不是歧视（欧洲人权法院：1983 年 11 月 23 日 Van Der Muselle 判决，A70，第 46 段）。

只有对情况相同的个人所作的区别缺乏客观和合理的理由时，才是歧视。特派团没有报告这一证据。

此外，根据判例（欧洲人权法院 1984 年 11 月 28 日 Rasmussen 判决，A87，第 40 段），各成员国法律制度是否具有共同点是判断区别待遇合理与否的适当参照。

因此，根据上文所列各项宪法，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法律制度在有关参选总统须具备的资格方面具有共同点。科特迪瓦宪法的确具有这一共同点，不可能是歧视性的，否则所有各项宪法都应被称为是歧视性的。另外，这些类似的宪法规定在这些国家中引起战争了吗？

2. 遗忘和遗漏的起因

在第 10 段中，特派团指出它认为冲突引起的一些人权问题。但经探讨后，可看出这些问题不是与人权直接有关。特派团忽略了可视为冲突引起的真正的人权问题：

(a) 资助反叛

当今，任何有识人士都不会认为叛军靠自我筹资来资助其颠覆行动。

- 被认为缺乏军饷的士兵如何能够购买像科特迪瓦一国都没有能力提供的武器？
- 为维持这些部队在口粮、后勤、运输等方面所需的资金来自何处？
- 谁这么慷慨为叛军提供他们炫耀连工资最高的科特迪瓦工人都付不起的卫星电话？
- 谁支付四个月来叛军车辆的汽油费用？
- 归根结底，谁为叛军撑腰？

自科特迪瓦危机爆发以来，这些问题令人困扰。为什么这些问题令联合国特派团员困扰？他们披上大公无私，主持公道的外衣，理应探索所有冲突根源。

各组织和各国都谴责未遂的政变。

是否能够追究后果，而不追问和不责问有关的筹资根由呢？

不这样做，就是宣告科特迪瓦境内的冲突长期存在。

对所到之处胡作非为的叛军提供资助的，恐怕只有犯罪组织。联合国特派团岂能袖手旁观？难道它忘记联合国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159 号决议强调“犯罪组织使用其财力破坏发展过程、影响生活素质并危及人权和基本自由，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基本机构的不稳定和腐败。”

应该倡导某些论点，例如 Yves Ekoue Amaizo 2003 年 1 月在《世界外交报》题为“科特迪瓦权力瘫痪原因”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某些私人财政寡头垄断集团实施其影响力，甚至一手遮天横加阻挠，不惜钳制南半球和北半球政府，使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提倡的竞争和透明度的举措受到限制。”

最后，特派团抵达布瓦凯后为何不询问叛军关于其生活资料和军费的问题。

(b) 外部干涉

根据《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23 条：“人民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享有和平与安全权利。《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团结和友好关系原则，也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确认，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

同一条第 2 款规定：“为巩固和平、团结和友好关系，各宪章缔约国承诺禁止……使用其领土作为基地，对本宪章任何其他缔约国的人民进行破坏或恐怖活动。”

在这方面，令人惊奇的是，联合国特派团没有把外部干涉问题视为冲突引起的人权问题。可是，根据国际公约，这种干涉侵犯人权。

联合国特派团的目的是“收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了解当地局势和为和平开辟道路的资料”，那么它怎样会忽略查究外部干涉？

法国同科特迪瓦定有防卫协定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先生 2002 年 12 月 16 日在《十字架报》中宣称：“我们谴责外部干涉，即科特迪瓦邻国实施的任何行动，供应武器、出兵支援等。我们将正视一切后果。”如果特派团不设法向安全理事会提供资料，那么安理会怎样能够了解当地局势？

主管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Kansteiner 先生 2003 年 2 月 12 日向美国国会众议院非洲事务委员会成员讲话说：“即使两位总统否认事实，我们知道一些叛军来自布基纳法索。他们的组织、战争计划的协调和所持的武器清楚表明他们获得外国援助。”特派团怎能够对此问题视若无睹呢？

尽管存在这些证据，特派团却没有发现冲突引起的人权问题。试想，这样特派团如何促进和平？

C. 有关各方的不公正陈述

1. 讲话方面厚此薄彼

特派团按照其不明确方法，让有关各方讲话。在这方面，厚此薄彼又表明其偏袒态度。

- 报告从有关乱葬坑部分的第 68 段起，有 9 段(第 68、69、70、71、72、73、74、75 及 77 段)让纪尧姆·索罗讲话。政府没有受到特派团同等对待，除俗套寒暄外，甚至连一次的真正工作会议也没有与特派团召开过。因此，人们不禁认为这个报告成为科爱运的论坛。在有关布瓦凯的乱葬坑的 15 段(第 68 至 82 段)中，只有 4 段可算是与特派团的目的有关，其余篇幅记载科爱运的辩词。

关于拘留和逮捕，报告提到 5 个人被关在本土警戒局(第 85 段)。奇怪的是，在谈到被科爱运拘押的人时，报告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

2002 年 12 月 19 至 20 日，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到日内瓦执行任务时，提交政府庄严声明的附件和列出被叛军拘押的军人和宪兵名单的证据。

这个文件的另一份副本附上一个光盘，载有叛军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鲜明图象，并已由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主任在阿比让交给特派团。为什么这样歧视政府？因为特派团成员没有就此事向叛军提出任何确切问题。

此外，如果特派团审阅证据，就会知道，根据 BTA(上述文件中的第一号证人)的指控，它宣称被任意逮捕的、为叛军占据的城市瓦沃阿的民主卫国会派市长助理马马杜·西塞曾建议向布基纳社区供应武器参加战斗。

2. 有利于叛军的陈述

经常狡诈地提出有利于叛军的陈述。

- 在第 35 段中出现以下不可思议的句子：“尽管科爱运领导人做出了努力，但仍有小偷小摸现象。”这是什么努力？这是否指不经审判处决涉嫌小偷的努力？⁵

正当人们指出叛军所到之处开放监狱和将一些监犯征募入伍，为其卖命当炮灰时，怎能够高唱为打击小偷而做出努力的调子呢？

一般来说，监狱的存在是为了打击逍遥法外情况。联合国高级专员特派团明知国际组织采取打击逍遥法外的措施，那么怎能够侈谈践踏这项原则的集团所做的努力？特派团的理据是因为科爱运不是一个行政机构。为什么这个集团主动发动战争？释放罪犯时他们是否考虑到受害人的感受？

- 在第 52 段中，关于部长埃米尔·博加·杜杜、Loula Dagrou 上校、Oble Dally 上校和 Yodé 上校被谋杀一事，特派团暗示这不是科爱运所为和对政府表示怀疑。从此，特派团为追查凶手另提一套。或许，特派团认为，甚至认定这些谋杀是政府所为。可是，事实上，自危机爆发以来，共和国总统已锁定叛军是杀人凶手。
- 特派团有意报告一些它不披露名称的人权组织的断言，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开脱叛军的罪责。在第 50 段中，某人权组织表示知晓政府控制区的处决数为 150 起。

但是关于叛军的即决处决行动，则无法提出一个数字。此外，有人表明尤以冲突爆发之初，叛军进行即决处决。

对冲突爆发很久之后许多相继遇害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因为在向驻日内瓦人权高级专员和抵达阿比让的特派团提交的案卷内载有遇害人父母的证词。

- 在第 84 段中，有一个人权组织(是否同一个组织?)估算在 2002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政府部队逮捕的人数为 150 人。在此同样对叛军逮捕的人数不详。
- 在第 121 段中，清楚表明在布瓦凯没有发生任何破坏公私建筑的事件。

这种断言不公正，再次证明调查工作不认真，草率了事。在布瓦凯确有公私建筑遭到破坏。

⁵ 法新社 2002 年 10 月 7 日报道处决小偷的事件。电讯具体说明“在叛军集合时，有一名携着袋子和风扇的男子由一名士兵押送。突然响起一阵枪声，该人遭冷酷处决。一名叛军满不在乎说，‘他是小偷’；其脸上弹痕累累。”

公共建筑方面：

- 叛军一开始就烧毁警察署。
- 法庭办公室的门破裂，盖章被人拿走。
- 专区政府和省府办事处、所有警察局、大学校园遭到洗劫破坏。

至于私有建筑，叛军洗劫一些私人住所和抢夺私有车辆。

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从布瓦凯的流离失所者获得的许多证据证实了这些事实。最鲜明的例子是一名布瓦凯商人，Konan N' zi Kan Kouame 先生的住所被洗劫，有 70 多辆运输车被损坏。

- 在第 125 段中，特派团在报告中指出“自法国部队抵达布瓦凯以来，人们注意到科爱运战士设法避免进行掠夺”。
- 上文关于第 87 段的评论意见在这方面仍然有效。

此外，特派团报告使用，“人们注意到”这个措辞，好像有目击者看到科爱运设法避免进行掠夺。然而，特派团于 2002 年 12 月只在布瓦凯停留一天。

3. 陈述不利于政府

一般来说，特派团在报告政府的解释时，它不对其说法是否真实表示意见(第 64 段)，似乎对科特迪瓦领导人有怀疑。

(a) 乱葬坑

- 在第 60 段中，特派团指称 Monoki-Zohi 有乱葬坑，并认定该地点位于科特迪瓦西部叛军控制区内。

特派团不斟酌这个乱葬坑的地理位置。特派团也不注意载在报告及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办公室在阿比让和日内瓦向它提交的宗卷的事实。它肯定要承认，前往 Monoki-Zohi (达尼亚的专区)的途中，必须经过有法国军队驻守的扎博。法国军队能否说见到科特迪瓦部队经过？特派团完全有询问他们的自由。这就是事实，特派团应予确定。

(b) 关于暴行和威胁的指控

- 在第 66 段中指出，“特派团询问政府的军事领导人，是否有军人因犯下暴行被绳之以法。”对此问题，特派团不用条件式。难道特派团认为政府军施暴？

特派团这种一口咬定和不尊重认定无罪原则的谴责，究竟说的是什么暴行？它是否暗示着科特迪瓦政府当局助长逍遥法外情况？

此外，人们可怀疑某名政府军领导人按其所任职务提供了这些不可置疑的资料。使用“领导人”一词，但没有指明道姓，是否旨在使证据含糊不清？

- 在第 107 和 108 段中指出，科特迪瓦的记者，尤其支持反对党的记者遭受暴力、压力和生命受到威胁，并且这是科特迪瓦安全部队所为。然而，特派团在列举这些行为时不能证实应归罪于安全部队的罪行。

此外，假定这些暴行是科特迪瓦安全部队和政府人员所为，怎样理解报告明确指出有两名支持政府的记者（《我们之道报》及《时事报》）也遭受侵犯这点？

特派团象“记者无国界组织几个月前”那样，奇怪地没有提到于 2002 年 9 月 19 日、9 月 29 日和 10 月 5 日科特迪瓦电视台的阿比让阿博博发射台遭受攻击和破坏。位于科特迪瓦北部的 Seguela、Nambo 和布瓦凯发射台也遭到攻击，在叛军控制区的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至今仍然停播；叛军用余下设施来传播其信息和进行宣传。

报告为何遗漏这些事件？因为将这些破坏行为归咎于政府是不可思议的。

- 报告在第 112 段中提到，自科特迪瓦陷入危机以来，政治杀害事件层出不穷，尤其以罗伯特·盖将军被处死为典型事例。必须说明在当前情况下，对盖将军之死尚未查明真相，因此一口咬定他遭到政治杀害是轻率的行为。

(c) 破坏棚户区

这种不公正的调查方式从对破坏棚户区事件作出的偏私和假装同情的解释也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棚户区已拆除。一项合理的城市整治政策必然导致居民迁移和拆毁建筑，这也是无可厚非，不容争议的。要知，这些预定的拆除措施出于安全原因。

特派团擅取对科特迪瓦当局作出评价的权利，宣称“这个问题引起严重的良心问题。蓄意毁损人居的住房依据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

就此问题指责科特迪瓦的人对于良心和同情并没有专利权。

特派团是否怀疑攻击科特迪瓦的人是一些棚户区成员？拆毁这些地区是迫不得已。应该向特派团提出一个问题：在生命和财产这两种价值之间应当选择那一种？科特迪瓦人认为生命比财产更宝贵。

我们的控诉人对收到的记录指出被强奸的妇女和受害者的家人的痛苦似乎没有那么愤怒。对于从布瓦凯被驱赶的人的处境他们感到气愤吗？

问题的关键是没有预先通知和涉及安置问题。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居民深表同情。几位部长已进行实地视察，并拟订和采取安置措施。许多无家可归者已在政府收容所栖身。这岂能说是毫无良知？

必须重申，我们的控诉人对良心并没有专利权。他们应设法帮助这些人获得足够的资源，让他们离开这些地区，象他们那样迁居豪华楼宇。

政府不是故意迫使这些人留在棚户区，可是由于战争，政府逼不得已，才如此做。因此，对棚户区的持久解决办法是，我们的控诉人致力使叛军放下武器。

(d) 遗留重要的资料

- 在第 22 和 23 段中，特派团指出国内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但它没有说明这些流离失所者的流动方向，他们从北到南流动。

我们认为这项资料很重要。

(e) 新闻机构

报告别有用心，设法使人相信共和国总统承认这些报章煽动仇恨。谁能够说在总统要求不要攻击外国人时，他的矛头尤其指向《我们之道》、《国民》和《博爱早报》等报章？

对于这些言论，必须说明对《国民报》的指责涉及这份报纸使用种族歧视言论攻击穆斯林社区和同性恋群体。

许多科特迪瓦人赞成特派团提出的意见，即关于人权的讨论构成强加于科特迪瓦的战争的必要手段，而国际刑事法院这个工具为必要配备。

事实上，特派团指称《国民报》言论偏激、仇外和鼓吹种族歧视，一如其他报章，是执政党的喉舌。对该报的指控也是对执政党的指控。

特派团暗示该报宣扬极右思想。由于极右派主张狭隘民族主义、实行歧视的特点和鼓吹排斥甚至铲除处于边际的人（例如同性恋者），万万不能吹捧。有鉴于此，必须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国民报》以及一些被视为使者的科特迪瓦政府官员提起诉讼。

应该澄清报告所述《国民报》立场强硬，发表仇外文章的说法。“这份报纸是用种族主义言论攻击穆斯林社区和同性恋群体的工具”。《国民报》的社论从未包括攻击同性恋的文字，因为同欧美比较，同性恋在科特迪瓦仍是罕见的现象。由此也许可以证明上述是一种轻率的说法。

D. 报告披露的情况

- 在报告第 145 段末尾中宣称科特迪瓦：“这是一个惊人的例子，一个非常好客的繁荣国家现在不得不对付其移民人口及其后代，他们要面对他们的政治后台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从报告的披露得悉，科特迪瓦境内的移民有政治后台。谁是他们的政治后台？特派团应该告诉我们。报告是否暗示外国人干涉科特迪瓦的政治？这种干涉对哪个政治集团有利？

特派团似乎说战争是为外国人发动的；肯定是为其中的一些人发动的。

E. 关于行刑队元凶

1.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 从第 55 段起，报告提到谋杀可能是由行刑队和私人民兵组织的。

政府认为这些罪行是在解放区犯下的。

2002 年 11 月 8 日，政府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在电视发表声明，谴责罪行和向哀伤的家庭表示殷切慰问。同日，政府与参谋长、宪兵总司令及国家警察署长，连同其亲信召开工作会议，以加强安全和动员安全部队及防卫部队搜捕这些罪行的元凶，把他们绳之以法。在同一声明中，政府重新指出当局坚决面对这些罪行，不能熟视无睹，再次邀请国际社会派遣调查团到科特迪瓦。

报告说：“特派团收集到的资料表明，行刑队可能是由政府亲信、总统卫队和总统所属族裔的部落民兵组成的。获悉了一些姓名。”

由于这些陈述性质严重，决不能因为要将其插入一般性指责中而熟视无睹。

这些言词，唯一的意思是：联合国特派团把所谓行刑队的罪责归咎于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及其总统。

理由如下：

- 首先，不应因文句中使用条件式而受迷惑。此外，这种语法显示出可能发生的情况。特派团提到所收集到的“资料”。但它没有说明资料来源，这种做法有别于报告其他部分引述人权捍卫组织、政党或叛军的资料。
- 第 59 段提到是科特迪瓦国民武装部队宣称科爱运制定将要处决的人的名单。如此给人一个印象，特派团把这种资料据为己有和对科爱运比其他有关方更加信任。在此没有显示其一贯作风：“特派团引用立场文件的这些部分并不对其表示看法。”（第 41 段）

关于可归咎行刑队的罪责，尽管“资料”的严重性，特派团的态度并不谨慎，连一点保留都没有。换句话说，可认为：凡是政府的言词，都有所保留，但对政府表示质疑时，就信以为真。

在“资料”后的“表明”一词反映出报告撰写者的意图。“表明”假定确实性，确定人们想象的事情真正存在。因此，联合国特派团手里有名单，不足为奇。不过，它致力打击逍遥法外，但却没有通知当局这些姓名，以便对这些罪犯提起诉讼。

从搜查队 2002 年 11 月 11 日第 942 号笔录的证明中，特派团知道已起诉无名人士，并在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 2002 年 12 月 20 日递交在日内瓦的副高级专员的档案内并入这些证明。

特派团的关注是打击逍遥法外情况，还是利用所谓资料的政治指控？

事实上，唯一查明的人和被认定有罪的是共和国总统，因为他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属于组成部落民兵的族裔。

特派团彻头彻尾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何况它是应维护该原则的机关，因此此举更加不能接受。这项原则得到普遍公认和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八条中加以申明。

这项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前阶段也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的司法机关对此有既定判例。

1995 年 2 月 10 日，欧洲人权法院 *Allenet De Ribemont* 判决第 35 段和后来的段落证明：“第 6.2 条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政府所提出的假设。事实上，法庭证明在 *Minnelli* 和 *sekanina* 案件中违反了这项规定 (...) 受理的国家司法机构对于第一宗案件因时效而结束诉讼，对第二宗案件则宣告当事人无罪。”法庭还承认甚至在国家司法机构不应对犯罪作出裁决的其他案件中也适用该条款。⁶

因此，甚至在审判开始以前，应该遵守无罪推定原则。

使用条件式不排除表现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特征。在 X 诉奥地利一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承认：“经过调查，婴孩极有可能被 68 岁的祖母杀害；单从文字来看，与起诉人一口咬定有罪的断语吻合，应予批评。如用较中立的措辞，就会满足公众的新闻需要。”

⁶ 欧洲人权法院，1982 年 3 月 26 日 *Adolf* 判决；1987 年 8 月 25 日 *Lutz 、Englert* 和 *Nölkenbockhoff* 判决。

不必确定联合国特派团能否反驳说它不过是表示怀疑，如同 J. A. Frowein 在欧洲人权委员会对 PETRA KRUISE 诉瑞士案件的评论中所宣称，⁷ “...表示怀疑会对诉讼产生影响，要是这种表示导致新闻界的采访报道或影响法官的审判”。⁸

联合国报告确实导致新闻界的采访报道，布基纳法索总统的采访中可觉察到这方面的迹象。《十字架报》和《世界报》根据这个报告锁定罪犯。

报告还暗中企图为诉讼辩护和影响主审法官的审判，因为人权高级专员口口声声叫嚷杀人元凶将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

总之，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确是本案的特点。

事实上，这种指控是针对科特迪瓦发动的国际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把受害人说成是刽子手，企图把武装夺权的行动合法化。

不幸的是，人们寄予厚望的国际刑事法院沦为战争利器，好比坦克、冲锋枪，为一批叛军效劳，人们一直想知道谁是其资助者。

2. 关于指控政府的几点意见

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对行刑队的指控，对矛头指向共和国总统和政府的指控可考虑到以下几点。

(a) 缺乏动机

除非人的思考功能有障碍，任何罪行决不会没有动机。动机是促使个人触犯法律的原因。

科特迪瓦政府实行这些罪行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威胁、报复、妒忌？

只需探讨一下受害者的个性，就能知道这些指控无中生有：

- 2002 年 11 月 2 日遇害的科特迪瓦人民运动主席 Emile Tehe 绝对不会危害政府。许多科特迪瓦人只是在他被杀时才听说过他。
- Rady Philippe Mohamed, 商人，对政府不构成任何威胁。科特迪瓦国家元首不是商人，他一直宣称他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行刺富商究竟对他有什么好处？
- Benoît Dakoury-Tabley 博士，按照证据科特迪瓦安全部队没有拘押他两天，他对政府不会构成威胁。他是否持有武器，是不是一名军事战略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点，断定他蓄意排除其家庭的其他成员。

⁷ 9077/80 号诉状 1981 年 10 月 6 日裁决；DR26，第 213 和第 214 页；7986/77 号诉状 1978 年 10 月 3 日裁决。

⁸ Dean Spielman 引述“平等审判和无罪推定”，人权季刊，1999 年第 669 页。

Dacoury-Tabley 家属十分清楚,他们在 Philippe Henri Dacoury-Tabley 宣读的声明中申明杀害其兄弟的元凶是这场战争的宣战者。

- Yêrêfê Camara、, Souleymane Coulibaly 和 Diomandé Soualiho 等人是否危害政府? 如果是, 怎样危害?

是否可认为科特迪瓦最高当局出于报仇动机犯下所有这些罪行?

如果认为他们想要报仇, 人们应该断定凡涉嫌参加反叛的人, 主犯也好、从犯也好都一律处决。要是这样, 又何以对涉嫌反叛分子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事实上, 自 2002 年 10 月 14 日以来, 在当前战争中:

- 有 23 人在阿比让法庭第 8 审判庭受审, 被控攻击政府当局, 参加武装团伙和与犯罪分子同流合污。
- 有 25 人在第 10 审判庭受审。所有这些人的名单已送达联合国特派团。一个暗地即决处决反对者的国家, 为什么还对他们提起诉讼?

为什么这个政府对一些人文明, 对另一些人野蛮?

(b) 谁从罪行中渔利?

一个明智的政权, 不管它多么不择手段, 也不会干徒劳无益的事。在这场冲突中, 科特迪瓦政府以和为贵, 不惜作出重大牺牲, 同叛军坐下来谈判; 应该回顾, 2002 年 10 月 31 日, 叛军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严厉谴责。政府所作的选择指明, 这些罪行对它一点好处都没有。

人们觉察到每当呈现有利于和平或掌权政府的局面, 就会有政府官员或其亲属遇害:

- Benoît Dacoury-Tabley 博士 2002 年 11 月 8 日死亡, 事发于叛军和政府洛美(多哥)签署一项协定的次日和在签署应导致战争结束的关于解除叛军武装方式的第二项协定之前; 前一项协定确认尊重宪法的合法性和尊重机构及领土完整。

对一个合法政府, 即使认为它只关心维持政权, 也不能期望太大。

认为政府当时会幕后指使杀害反叛首领的兄弟是否合理?

人们可断定这项罪行除科特迪瓦当局之外, 对各方都有利。

此外, 叛军已趁机中止谈判。

Dacoury-Tabley 家属在所发表的声明中宣称不愿看到利用其儿子死达到政治目的或作为停止谈判的口实; 奇怪的是, 国际新闻界却对此保持沉默。

- 绰号叫“H”的喜剧演员 Yêrêfê Camara 于 2003 年 2 月 2 日死亡。事发于有数百万人，包括外国人、尤其欧洲人、黎巴嫩人和西非人民参加拥护掌权政府的历史性游行的次日。

国际媒体首次不得不承认这次支持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的游行浩浩荡荡，阵容强大。

诬蔑科特迪瓦的宣传刚刚碰壁。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政府此时正好策划谋杀著名喜剧演员“H”；谁会“听信这点”，因为他们明知此举会玷污政府的国外形象。

连最愚蠢的独裁政权也不会这样做。

之所以犯下这项罪行，是为了把证明政权得人心的庞大游行从人民的记忆中一笔勾销。

这只能使掌权政府的敌人从中渔利。

有鉴上述，很多科特迪瓦人担心次日美国国会对《利纳-马库锡协定》持有保留，行刑队刚刚再次行凶，以损害科特迪瓦政权的声誉和转移大家对国际社会谴责武装夺权行为的视线。

- 如果政府是罪魁，那么高举维护宪法的合法性大旗，从事拥护当前政权活动的工会干部 Mahan Gahe，2003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至 12 日星期三晚何以逃过行刺？当时穿着军服和持枪的人冲入其在安亚马的住所。他因住所的警报系统把杀手吓走而得以保住性命。

(c) 事实质问

科特迪瓦政府经常遭受指责，除非认为政府没有一点智慧，不然，认为它是行刑队元凶，就得承认它是笨拙的罪犯。

在我国现代历史中行刑队一般秘密行事，以求取得效率。有关罪行的情况令人产生疑问：

- Dacoury-Tabley 博士的尸体在富人区被发现，Emile TEHE 的尸体也在北方公路上被发现。
- 民主卫国会活动分子早上 5 时在该会有许多成员居住的平民区发现 Yêrêfê Camara（绰号叫“H”）的尸体。

根据这些事实，可认为这些凶杀的作用是让尽量多的人看到。换句话说，如果宣传不是这些杀手的目的，似乎也是其战略的一部分。

只要有点智慧的政府都不会这样公开其受害人的身份，因为它明知这样会弄巧反拙。

结论

René Degni-Segui⁹ 教授关于 2000 年 10 月和 12 月科特迪瓦事件前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作出的评论，断定：“归根结底，委员会的构想脱离事实，导致它不查明真相（即调查的目的），而是维护一个政党的事业。这样，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委员会的报告理应把我们向前推进，但因局部和偏袒的陈述致使真相大白的进程倒退”。

针对刚到科特迪瓦查明事实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这个结论完全中肯。科特迪瓦严厉批评这个报告，认为特派团以强词夺理的既成事实取代民主和人权的呼声。

联合国人员若坚持这条道路，恐怕只会导致各国人民逐渐舍弃世界组织，这将是人类浩劫。

特派团注意到许多科特迪瓦人信任世界组织。

有鉴上述，等到我国长期请求派遣的实况调查团来到科特迪瓦后，是否会发现科特迪瓦人信任它？

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

人权事务部长级代表

维克托里尼·沃迪埃

2003 年 2 月 17 日，于阿比让

⁹ 前联合国卢旺达问题特别报告员。

附件

联合国紧急特派团的报告第 13 段犯下两个严重失实的错误：

- 第一个失实的错误：

报告提到 2002 年的新宪法。事实上，科特迪瓦的新宪法是于 2000 年 7 月 23 日公民投票后通过，并于 2000 年 8 月 1 日颁布，其标题是：

关于科特迪瓦共和国宪法的 2000 年 8 月 1 日第 2000-513 号法

- 第二个失实的错误：

联合国报告指出，最近巴博当选总统的总统大选日期从 2002 年开始，在这个日期影射了所有事件。

应该坚决申明最近的总统大选是 2000 年，而不是 2002 年，由盖伊·罗伯特将军领导的军政府安排举行。在这些选举中，非政府成员的洛朗·巴博先生是反对党的候选人，身份如同其他反对党的其他候选人。因此，按照逻辑，他不能一方面遵守宪法的严格规定，另一方面操纵宪法，排除其他候选人。